

***Vermeer's Hat: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Dawn of the Global World.* By TIMOTHY BROOK. New York: Bloomsbury Press, 2008. xi, 272pp.**

《維梅爾的帽子》（以下簡稱《帽子》）討論了17世紀的全球貿易，這不僅是這個領域的重要著作，還補充了17世紀中荷觀念交流的圖景。以往討論中荷貿易的著作多從宏觀經濟的角度出發，例如萊頓大學包樂史（Leonard Blussé）教授的《中荷交往史》（阿姆斯特丹：路口店出版社，1989）等。《帽子》則從文化的視角，通過一個畫家的作品折射出17世紀社會複雜交錯的流動圖景，即利用17世紀荷蘭黃金時代繪畫大師維梅爾（Johannes Vermeer，1632-1675）的畫作為歷史文獻，從中「想象地」透視出中荷貿易交流史的動態景象，這種做法革新了歷史學研究的視角。

治明清史的卜正民（Timothy Brook）在本書開篇，就清晰地界定了所要研究的範圍和主題。從時間上說，它主要處理的是17世紀，作者稱該時段為「第二次碰撞」（頁19）；從社會史的角度來看，它主要限於從荷蘭港口代爾夫特出發考察商業貿易與中國的關係，同時將文明變遷與技術、貿易以及商業聯繫起來。最為重要的是，它並非描述維梅爾的藝術觀念和信仰，而是集中關注具體的實踐，如繪畫中所表現的人口與商品流動，物品所包含的新意義等。作者的基本出發點，在於認定這種貿易的全球化必須放在經濟、社會和文化擴張的角度來考察，貿易的全球化也產生了文化的碰撞。

荷蘭在17世紀全球貿易史上佔據着重要的地位。在貿易問題上，作者注意到在17世紀荷蘭已經與晚明有商業交流，因此中國可能是引領17世紀世界貿易史的恰當路徑。正因如此，明清社會文化研究才為他探討《帽子》中的貿易世界奠定了基礎性工作，「現在則是去追尋中國如何在17世紀全球貿易中展現自身的網絡：呈現一個更大的……整體，即一個人類從未曾編織的關聯和交流網絡的世界」（頁6），16世紀只是「一個發現與激烈碰撞的世紀」（頁19），18世紀則是帝國的世紀。作者認為，17世紀的交流在文化和地理上已經有別於其他時代，變得「更持久且易於重複」，因此該世紀可以被稱為「全球貿易之開端」（頁21）。

本書共8章，除了結語「沒有人是孤島」（17世紀英國詩人約翰·鄧恩〔John Donne〕語）之外，作者通過維梅爾的七幅畫構成了七個章節，標題分別為「從代爾夫特看世界」、「維梅爾的帽子」、「一盤水果」、「地理

課」、「抽煙學校」、「秤白銀」和「旅行」。前言（頁1-10）交待了作者考察問題的緣起以及對書中所包含一些主題的討論，從一定程度上說，這部份具有方法論的含義，即透過一個畫家的作品來觀察17世紀的貿易交流，或許可以稱之為「以圖證史」。作者開篇顯示了他拒斥用馬克思的經濟模式與官僚體系的方式來觀察世界貿易之間的交流與碰撞。相反，他將自己納入一個傳統，即探討畫中的物品「在那裡作何用？由誰製造？來自何處？為何畫家要畫它，而非其他？」（頁9）。作者首先用《代爾夫特一景》來描述代爾夫特在17世紀的重要性，例如它是荷蘭的重要港口，同時是東印度公司（VOC）與亞洲貿易的中樞。作者甚至用《華嚴經》中所說的「因陀羅網」來表示代爾夫特在17世紀世界中已經組成了一個密不可分的貿易網絡（頁22）。

作者希望從第二幅《官員和微笑的女子》中官員頭上所戴的帽子，來揭示尚普蘭（Samuel de Champlain）等探險家們如何在美洲追尋一條由五大湖通往太平洋的海上交通要道。卜正民圍繞尚普蘭的夢想，編織了一連串關於羊毛、皮革貿易等的故事。探險家活動地點雖然集中在北美，實際上他們仍然是在試圖找到一條通往中國的商路。最後作者認為尼科爾（Jean Nicollet）的袍服「顯示了尚普蘭的夢想是到達中國」，維爾梅的帽子則是「這種追尋的副產品」（頁51）。

第三幅《少婦開窗讀信函》意在通過中國的瓷器來探索從代爾夫特通往中國的貿易長廊，與此同時，描述東印度公司在運輸瓷器等物品上所起的重要作用。作者用歐洲市場的情形，對比了蘇州文震亨、嘉興李日華等江南書畫家對待瓷器的態度，認為在看待歐洲瓷器銷量一片大好而舶來品被中國人視為一個「問題」時，這與物品所「傳達的文化內涵有關」，但中荷雙方對待舶來品的不同態度，「根本上說與審美或文化無關，關鍵在於各自能如何看待更廣闊的世界」。例如，作者強調代爾夫特人將中國的瓷器認作財富的象徵，象徵着他們「積極地看待外部世界的心態」（頁82）。值得一提的是，最先向荷蘭人介紹中國瓷器的應該是1584年由澳門回荷蘭的達克·龐帕（Dirck Gpomp），而非書中提及的范·林斯豪登（J. H. van Linschoten）（頁62）。當然，在1596年的荷蘭，對中國瓷器記述得最詳細的，當屬林斯豪登的《航海志》。

作者強調第四幅《地理學者》，旨在理解「那些商人和旅行者所見的外部廣闊世界，並且從那裡帶來了一些奇珍異寶和驚異的新信息」（頁84）。維梅爾着重描述了地圖與地球儀，以及當時人們心中的中荷形象。卜正民認為，「17世紀的地理學者的職責在於積極地參與到無盡的回饋與修正過

程」，也就是說建立一種長效的「回饋機制」，因此「舊有的地理知識逐漸不斷得到取代」。這種回饋機制在中國地理學者那裡則「較少地體現出來」，儘管也有航海者獲得了海外地理知識（頁113-114）。這些反映了中國傳統的天下觀、宇宙觀未能得到撼動。對於大多數中國人而言，中國仍然是世界的中心。附帶一提，作者提到了蔡汝賢《東夷圖說》（1596）中的「黑鬼」，並認為「這可能是中國人描寫非洲人的最早圖象」（頁97），這種說法可能不確切：嘉靖二十七年（1548）朱紉《甓餘雜集》卷2就記載了「三名黑番」中有非洲人（參見廖大珂，〈明代「佛郎機黑番」籍貫考〉，《世界民族》，2008年，第1期）。

第五幅圖景其實是一個43釐米的藍白瓷盤，它所描繪的是仙人的忙碌景象，切入點是仙人抽煙。作者從描繪中國人抽煙出發，描寫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同時帶領我們走進17世紀全球煙草貿易。作者其實還試圖將17世紀的煙草貿易與19世紀鴉片聯繫起來，同時反對詩人陳琮《煙草譜》所載煙草經由西班牙人（實為荷蘭人）之手從馬尼拉傳入福建於1567年所開的月港（頁150）。

《持秤的婦女》是卜正民要探討的第六幅畫。作者從畫中維梅爾妻子卡塔莉娜（Catharina）身上的銀幣入手，為讀者勾勒了那個時代全球性的重要商品——白銀。作者認為，白銀在17世紀的作用或直接或間接地體現在南美著名銀礦波多西的出現；體現在馬尼拉成為歐洲與中國經濟結合的樞紐，以及1603年馬尼拉屠華事件；體現在明清的奢靡風尚，和晚明時期物價上漲；還體現在福建漳州月港在商貿中的地位日益加強。作者解釋了白銀成為「當時最重要的世界商品」（頁155）和中國成為「歐洲財富的歸宿」（頁159），是因為歐洲人持白銀到中國可以買到兩倍於他們國內的物品。

荷蘭接納、消化了各種不同的移民浪潮，後者又在物質和文化方面豐富了荷蘭；奴隸貿易則成為了資本原始積累的重要工具。作者試圖從第七幅畫《玩牌者》（儘管並非維梅爾的作品，但體現了他的繪畫風格）中告訴讀者一個旅行、移民、奴役的世界。作者以六個黑人男童為起點，揭示了非洲奴隸在東亞的冒險故事，這種行為進一步反映前近代化東亞的過去。

結語部份，作者承接他的名著之一《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中有關對外貿易的論述，再次重申本書的目的之一在於讓我們了解東西方歷史之全球化的方式。作者還認為「中國比其他地方可能更適合探討17世紀世界變遷」（頁231）。假如承認「文化區域」仍然是20世紀早期人類學中的基礎概念，那麼這種跨文化變遷

實踐就是作者在本書中試圖強調的，因為「習慣和物品等徹底地從一種文化移入另一種文化，最終變成後者的一部份，同時還改變了移入文化」（頁126），商業貿易則是改變官僚體系或文化素養的重要因素之一。甚至可以說，西方文化在現代化過程中以經濟上的優先地位獲得了全球話語權，似乎有淡化其他文明的貢獻之嫌。在持續對歐洲中心論進行批評的同時，反觀柯嬌燕等清史專家近年考察全球比較史的視角（柯嬌燕，《什麼是全球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那麼或許在全球化日益加強的今天，交叉史（*histoire croisée*）是史學研究中的熱門話題。這也意味着須重新思考文化在區域內的碰撞，同時考察它們在邊緣—半邊緣—中心之間的移動，《帽子》則是這種研究取向的重要探索。

《帽子》也是一本在方法論上利用圖象學展開跨文化研究的重要著作。當然，除了作者重點論述的世界主題，諸如煙草、白銀、奴隸等，本書還包含了大量與中國宗教和思想史相關的洞見，如宗教因素在中西繪畫中的體現等（頁214）。它還提出了一些有待進一步解決的問題。例如，商業貿易與軍事組織之間相互影響，因此有必要考察貿易所依賴的政府「政治生態學」，包括軍事組織和技術以及官僚管理。「朝貢體系」下沒有單純的貿易，更沒有主權平等的外交。甚至朝貢關係、禮物和聯盟依賴於儀式和傳統，同時它們又與宇宙觀相連。只有將這些綜合起來考慮，才能解釋明末荷蘭人要求在華（主要是福建）通商失敗的原因。不過，《帽子》一書中留待解決的課題對我們接下來的研究有促進作用。

賴國棟

廈門大學歷史系

***Journeys to Empire: Enlightenment, Imperialism, and the British Encounter with Tibet, 1774-1904.* By GORDON T. STEWAR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xiv, 280pp.**

西藏向來是一宗教氣氛濃厚和政治敏感的地域。對於西藏的研究，亦大多集中在這兩方面的討論。由雍正五年（1727）清廷設駐藏大臣以穩定西藏區內的政治形勢，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定「金瓶掣籤」以解決靈童傳世